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 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运用与发展

——以“枫桥经验”为研究对象

尹华广

(重庆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0045 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所 浙江 绍兴 312000)

【内容摘要】“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运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运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其发展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把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视为解决矛盾的基础;加强民主法治,依靠制度解决矛盾;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妥善处理矛盾;创建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效果。

【关键词】枫桥经验 基层矛盾 运用 发展

中图分类号:A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0-0077-04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经修改后,于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正处》已发表了50多个年头,虽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处》的理论对我国社会矛盾的解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点是社会矛盾尖锐、多发、复杂,这在基层表现尤为突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有许多典型经验,“枫桥经验”就是其中之一。以“枫桥经验”为例,探讨基层矛盾化解对《正处》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

“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1][P43]}。在1963年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同年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诞生。“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一直以化解基层矛盾为己任,历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而历久弥新。党中央对“枫桥经验”一直非常重视。2003年在浙江诸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罗干同志

指出:要学习创新“枫桥经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08年在浙江绍兴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上,周永康同志指出: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枫桥经验”可分为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两个不同阶段或更确切地说两种不同类型。

(一)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

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主要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容:一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二是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的经验。

1.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改造“四类分子”运动中,作为试点区之一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即文斗的方式,没打人,也没捕人,就将“四类分子”给制服了。对此经验,毛泽东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的经验

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于1978年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到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

* 本文为浙江省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重点课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运用与发展——以“枫桥经验”为研究对象”(课题号:125044)的最终成果。

* 作者简介:尹华广(1970-),男,重庆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主要包括: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

1.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中期,枫桥的干部群众运用“枫桥经验”,从抓典型入手,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就地改造流窜犯方面,摸索出了“管头(即做思想工作)、管脚(防止外逃的措施)、管肚皮(安排好劳动和生活)”的成功经验,在就地改造流窜犯的基础上,创造了“三清一落实”的“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所谓“三清一落实”,“三清”是指查清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原因;查清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规律,查清帮助教育改造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一落实”是指落实帮教措施。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后,针对新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枫桥干部群众在全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机制,创造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成功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枫桥经验”发展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2]P15}。

3.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

近年来,枫桥干部群众创建了“平安协管员”、“治安信息员”制度,创新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强调“部门协同、村镇联动”,通过建立机制,预防矛盾,通过民间调解,化解矛盾。2003年以来,开展与落实“综治工作进民企”,促进经济发展,推进村民自治,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3]P5}。

二、《正处》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运用

“枫桥经验”是对《正处》理论运用与发展基础上而产生的经验,它对《正处》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对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有着深刻的论述,而“枫桥经验”正是其理论的生动实践。

1.正视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号召各级干部群众要正视矛盾,而不要否定矛盾的存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4]P372}“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4]P364}他批判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错误观点并指出其后果,“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

处于被动地位”^{[4]P372}。“枫桥经验”充分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十分重视矛盾的存在,并且将矛盾放入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创造了化解矛盾的经验。

2.科学分析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中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P364}同时也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4]P398}“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4]P397}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矛盾的现状与特点的。同样,“枫桥经验”根据不同时代背景与社会现状,科学分析矛盾,这是它能解决好矛盾的前提。首先,它正确定性矛盾,在“枫桥经验”解决矛盾的历程中,有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与为“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是解决敌我矛盾的经验,而就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其次,它重视矛盾产生的社会背景,将特定矛盾与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后,它正确分析矛盾的内容与特点,每个时期经验的命名,就充分体现了那个时期矛盾的内容与特点。如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中,如何改造“四类分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与特点。

(二)运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4]P365}敌我矛盾用专政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4]P368}他特别强调,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倒可以把一些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5]P218}。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4]P365}“枫桥经验”正是在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的基础上,运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这表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说,时代背景不同,矛盾特点不同,“枫桥经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从微观上说,对同一矛盾,具体情况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相同。如在改造“四类分子”时,首先,明确这是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将“四类分子”分成两种,一种是破坏活动极大,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一种是破坏活动不大,民愤也不大的“四类分子”。对于前者,采用专政的方法;对于后者,采取的是说理、教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

三、《正处》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发展

“枫桥经验”对《正处》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视为解决矛盾的基础

毛泽东当年在《正处》一文中尚未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出路,这是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地方^{[6](P103)}。“枫桥经验”用生动的实践发展了这一理论,主要表现在:首先,靠发展经济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层矛盾是这一主要矛盾在基层社会的表现。这就表明,物质文化的需要即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包括基层矛盾在内的所有矛盾的基础与中心。枫桥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提出的社会治安的总体思路,是“在经济发展中,致力于提升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使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文明全面发展,进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其次,根据区域特点,发展块状经济,以经济为手段化解矛盾。枫桥镇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扶持和发展轻纺、衬衫等优势产业,引导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这样既发展了经济,又提高了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利用率。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做大以后,企业与农民争地、争水、争电等矛盾也迎刃而解。最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加强民主法治,依靠制度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对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过论述,他说:“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4](P371)}。“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4](P369)}。但他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是明显注意不足^{[7](P45)}。“枫桥经验”的实践弥补了这种不足。加强民主法治,依靠制度解决矛盾,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发展。枫桥镇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抓科学的决策。枫桥镇建立完善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二,抓透明有序的监督。透明有序的依法监督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保障,枫桥镇通过政务、财务两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其中,财务公开包括实行财务公开日制度,对村级大笔开支、村干部报酬、接待费用实行明细公布,让群众看得懂,并建立民主理财小组,实行民主监督。第三,抓扎实有效的教育。对广大群众进行普法教育,是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具体包括:注重以文育人、注重以法律人、注重以情感人三个方面。第四,重制度建设。“枫桥经验”重视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政权作用,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处理好治安问题。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三级调解组织,把大量纠纷和治安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反过来,良好的制度建设也保障了基层自治的民主性与广泛性^{[3](P182)}。发展基层民主制度、加强法治建设,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化解基层矛盾方式、方法的新发展,也是对《正处》理论的新发展。

(三)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妥善处理矛盾

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妥善处理矛盾,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期对《正处》理论的新发展。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面:首先,“枫桥经验”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出发,一切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枫桥人也同样把“四类分子”当人看,坚持按照“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的原则和“给出路”的政策,尊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人格和基本权利。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更是突出人本关怀,如对外来建设者实行本地化、亲情化管理。其次,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贯穿在“枫桥经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条主线^{[8](P54)}。“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几十年来,“枫桥经验”就是依靠群众,通过及时排查矛盾、化解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可以操作的实践,把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基层每个角落作为自己的责任。从“枫桥经验”的实践来看,依靠群众,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依靠高素质的群众。“枫桥经验”坚持以人为本,把立足点放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上,着力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必须依靠群众选举、群众公认、为群众办事的基层组织。枫桥地区绝大多数矛盾能够在基层得到化解,几十年保持社会稳定,关键得益于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健全的村级组织,广大基层干部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善于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最后,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是“枫桥经验”的灵魂。从“枫桥经验”的产生来看,它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更是枫桥人民的伟大创造。在“枫桥经验”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中,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良人文传统的枫桥人民做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决定意义的重大贡献。

(四)创建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果

创建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果,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期对《正处》理论的又一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这些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主要包括:(1)“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2)“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即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3)“矛盾化解五分法”即分工负责,维稳责任具体化;分块实施,综合治理网格化;分层掌控,源头预防动态化;分级联动,矛盾化解即时化;分类管理,服务教育人本化。(4)“部门协同,镇村联动的机制”即在镇一级通过加强政法部门的横向联系与配合,加大、加快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和速度,加强镇、管理处、村三级调委会的联系,矛盾纠纷原则上按这三级逐级化解。(5)“审判与调解的联动机制”即枫桥人民法院对没有经过调解直接起诉到该法庭的矛盾纠纷,发给《调解劝导书》,劝导当事人首先寻求调解途径,解决矛盾纠纷。(6)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三帮三延伸帮教工作法”即“三帮”指帮心、帮富、帮到底,“三延伸”指事先向监所延伸,事中向生产延伸,事先向巩固提高延(下转第84页)

(二) 孙子女、外孙子女之法定继承权完善

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权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代位继承的性质问题。一直以来代位继承分为两种学说,一种叫代表权说。认为,被代位人的继承权是代位人继承的根据和基础,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或拒绝继承,其直系卑亲属即无位可代,因而不能继承。我国继承法采代表权说。按照现有的代表权说,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在被继承人的子女未丧失继承权且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代位继承。在子女丧失继承权或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就无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的法定继承权。

笔者认为,现有法律规定是不合理的。首先,祖孙之间的亲情关系和经济联系不依赖于子女,子女不孝,并不当然影响孙子女与祖父母的关系。法律直接规定子女丧失继承权其直系卑亲属不得代位继承,不符合继承的习惯,也有违被继承人的愿望^[8]。如果承认可以代位继承,不仅符合按支继承的习惯,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家庭矛盾。其次,如果不依法保护(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则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即父母已经死亡的(外)孙子女杀害(外)祖父母的,因其不是继承人,不会被剥夺继承权,同时因其父母没有杀害继承人,享有继承权,故仍得行使其代位继承权;(外)孙子女为争夺(外)祖父母的遗产而杀害其父母的,只丧失对其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并不丧失对其(外)祖父母遗产的代位继承权。所以,应当认定代位继承的固有权性质,这种固有权只要在被代位人先于代位人死亡时,就能够被合法行使,不因任何其他事实的发生而改变。

(三) 胎儿之法定继承权完善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在胎儿活体出生后才溯及于继承开始时享有继承权。不足之处在于实践中使得胎儿不能在出生前,在继承开始遗产分割时由其父母代为行使继承权,从而难以保障胎儿财产利益的取得。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胎儿的法定继承权,我们需要明确规定,只要继承开始时存活的胎儿,便享有继承权。且无论出生时为活体还是死体,均享有完整的法定继承权。同时,这样也使得当发生母亲为了获得遗产而故意折磨自己,不惜

牺牲腹中的胎儿,例如,用吃打胎药、打坠胎针或秘密做人工流产等手段打落胎儿,以谋取遗产,或者原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了夺取胎儿应继承的遗产而瞒着胎儿的母亲,买通、指使或引诱、胁迫助产人趁胎儿出生时害死胎儿的情况时,可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剥夺行为人的法定继承权,保护胎儿的法定继承利益。

参考文献:

- [1] 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5.
- [2] 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77-382.
- [3] 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7.
- [4] 陈苇.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69.
- [5] 付翠英.论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9.
- [6] 王鹏.胎儿利益保护之比较法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30.
- [7] 朱月林.亲子鉴定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10).
- [8] 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27.
- [9] 周相.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4.
- [10] 费安玲.罗马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0.
- [11] 程维荣.中国继承制度史[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252.
- [12] 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5.
- [13] 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7.

(上接第79页)伸。(7)对社会区矫正人员的“5+1”监管模式即从镇司法所、协作站(社区)矫正小组、公安责任民警、村治调组织、矫正对象家属五方面来确定人员,分别落实监管职责。其中,“5”是指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村责任人和矫正对象家属五个方面的人员,其中“1”是指矫正对象本人。

参考文献:

- [1] 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10(7).
- [2] 史济锡.创新“枫桥经验”推进法治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J].政策瞭望,2006(9):15.
- [3] 汪世荣主编.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5] 周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6(1).
- [6] 倪晓林.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07(3).
- [7] 荣开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理论贡献和时代局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 [8] 金伯中.“枫桥经验”新发展的理性思考[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6).